

“河洛古国”是真的吗？

裴安平

(<http://www.peianping.com>)

在专家们的支持下¹，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不仅成为了古国所在地，还因此入围了 2020 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发现²。

然而，双槐树既不是“河洛古国”所在地，也说明学术界衡量和认定“古国”的标准出了问题。

—

2020 年 5 月 7 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点评确认其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为什么要命名为“河洛古国”呢？主要理由有三点。

第一，面积大。

是仰韶文化时期从郑州到洛阳这一广大地区面积规模最大的“巨型”聚落遗址，达 117 万平方米。

第二，特别有内涵。

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图 1），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其二，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简单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 370 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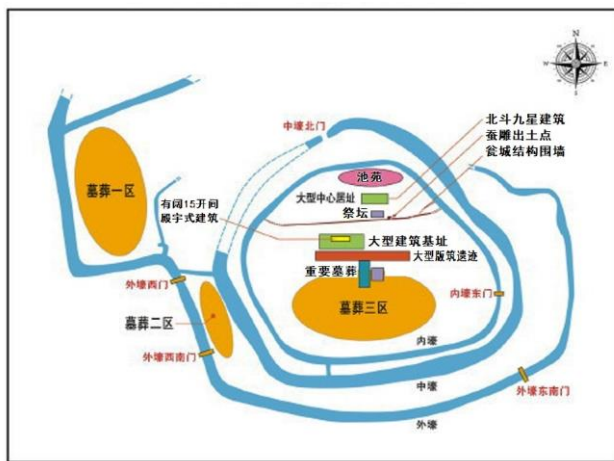


图 1：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引自：《新华每日电讯》：《“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

18000 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第二，是区域性的中心。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都对双槐树形成

¹ 苏媛：《发现河洛古国》，《南方周末》2020 年 6 月 4 日。

² 《巩义“河洛古国”考古项目入选“2020 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河南日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拱卫之势³。

正因此，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就在于，实证了距今 5300 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与此同时，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不仅是黄河文明之根，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而且双槐树遗址就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和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的政治文明核心地位。

二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巩义双槐树遗址根本不可能是“河洛古国”所在地。

（一）大遗址不是古国诞生的条件和标志

史前完全是一个血缘社会，遍地都是血缘组织。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还表明⁴，遗址就是包含有历史遗迹遗物的地点和场所，而聚落则是血缘社会聚氏族而居的地点和场所。

从旧石器早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距今约 8 千年，聚落遗址规模面积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虽然个别遗址也规模巨大，如安徽水阳江流域宣州陈山至今仍有数十万平方米⁵；但绝大多数都规模很小，一万平方米以下。

第二，随着食物主要来源方式由最初的狩猎采集变为广谱经济，人口也增加了，聚落遗址的面积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地位和等级分化，所以即使是长辈母氏族所在，其规模大小与其它普通聚落成员之间也并没有明显区别，内蒙古赤峰林西距今约 8 千年的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双围沟聚落遗址（图 2，4）⁶就是聚落群即部落内各成员独立平等聚落面积接近的典型代表。

第三，由于地广人稀社会矛盾比较平和，所以整个社会只有聚落、以聚落为单位组成的聚落群、以聚落群为单位组成的临时性聚落群团等三种聚落组织，并分别对应民族学的氏族、部落、临时性部落联盟等组织形态⁷。有关的研究还表明，当时聚落社会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组织形态都完全是自然的；以血缘为社会组织纽带的现象就不仅是自然的，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距今 8—5 千年，由于农业的兴起，人与人之间因土地和水资源而诱发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为了应对危机，文明起源了，基于实力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一体化高潮首先从聚落群开始，群内聚落遗址之间也由此出现了明显的规模差异。

第一，聚落群的文明一体化导致内部各成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地位分化和主从关系，出现了核心聚落；而且核心聚落的规模面积还历史性地超越了聚落群内的其他成员，河南新郑唐户裴里岗文化遗址（图 2，1）⁸、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⁹即如此。

第二，核心聚落之所以面积超群，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之一，在核心聚落的外围先后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濠沟，以及壕沟（濠沟）加城墙的双重防御体系，而且规模

³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

⁴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

⁵ 房迎三：《中国的旧石器地点群》，《华夏考古》1993 年第 3 期。

⁶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⁷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

⁸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第 5 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 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 年第 5 期。

⁹ 王海明：《专家论证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 年 1 月 11 日；王海明：《嵊州小黄山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浙江文化信息网 2005 年 8 月 5 日；张恒等：《“小黄山”万年古文明的见证》，嵊州新闻网 2011 年 4 月 25 日。

越来越大。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就是这方面的典型¹⁰。距今 6.5 千年，汤家岗文化晚期，遗址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但实际居住面积 4 万平方米以下（图 2，5，I）。因为，遗址外围出现了长年有积水的濠沟，口宽约 15 米，整体所占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近遗址总面积的 1/5。距今 6 千年，遗址变成了城址，整体约 8 万平方米（图 2，5，II）。其中，城濠宽约 15 米，墙体宽约 9 米，二者占地面积共约 2 万平方米，近遗址总面积的 1/4。之二，聚落居住区范围内新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大型公共设施，如浙江义乌桥头壕沟聚落就在遗址中部发现了原始面积近 1600 平方米的“中心台地”¹¹；湖南澧县城头山在大溪文化城址东部也发现了当时的祭坛¹²。

第三，无论是濠沟、濠沟遗址和城址，内部都只有一个聚落居住；因为一体化聚落群只有一级核心，即核心聚落；所以规模普遍偏小，距今 5 千年以前连沟带墙都不超过 8 万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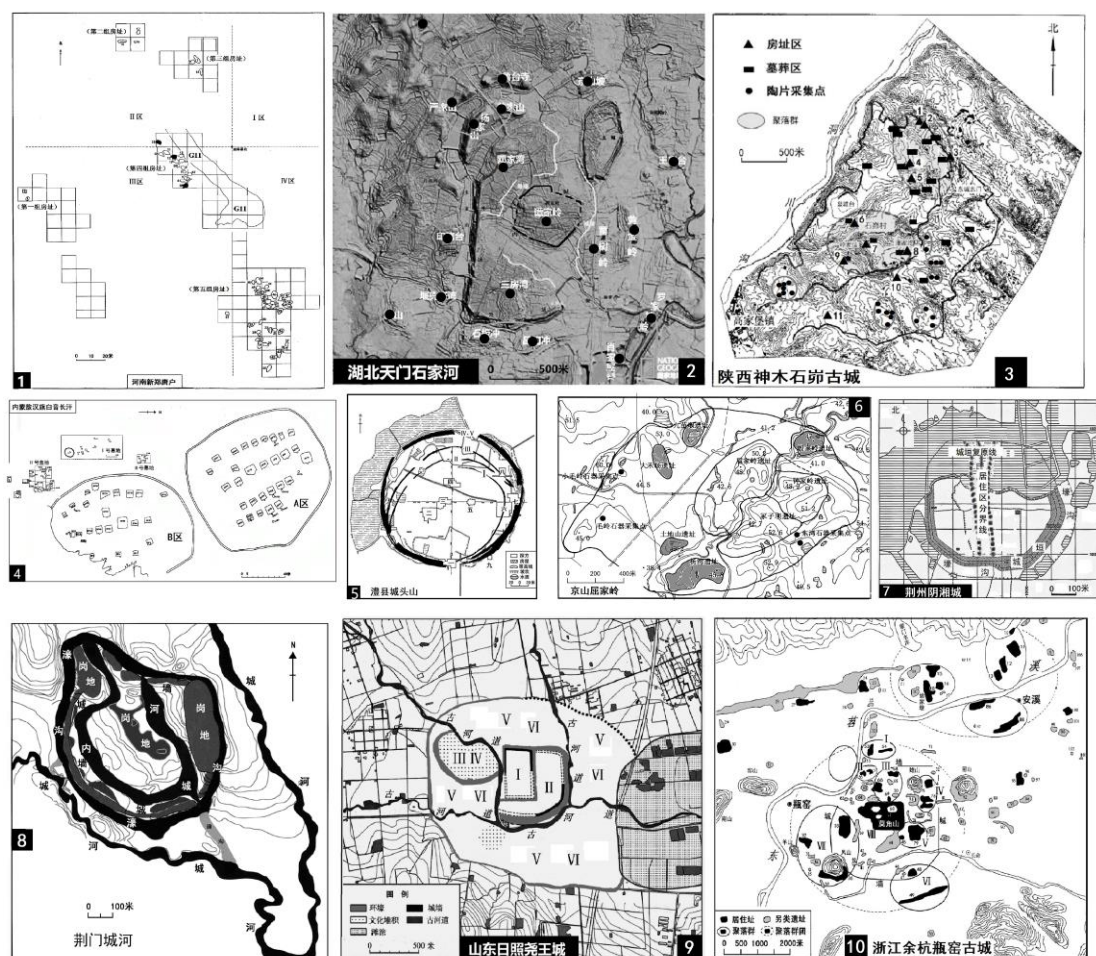


图 2：有关聚落遗址平面图

（1 引自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 2007 年发掘简报》，2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3 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4 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5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6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简报》，7 引自[日本]冈村秀典等《湖北阴湘城研究》，8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9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10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距今 5—4.5 千年，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以往的临时性部落联盟开始升级为一体化领导和管理的永久性部落联盟，从而导致遗址的规模面积又升级了。

¹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 年。

¹¹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我们在桥头远望——义乌桥头遗址发掘记》，2020 年 4 月 13 日。

¹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 年。

第一,如果说距今5千年以前聚落遗址面积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物”的原因,即遗址内有关设施的不断增加与扩容,如单一壕(濠)沟变成壕(濠)沟加城墙。但是,距今5千年以后,聚落遗址面积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则变为“人”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与一体化多聚落遗址的出现。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就是一个聚落群共同占有的代表(图2,2),山东日照400万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尧王城遗址就是一个聚落群团集体占有的代表(图2,9)¹³。

第二,由于部落联盟的组织成员都是聚落群即部落,所以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就变成了核心聚落群,因此核心聚落群集中居住的遗址其规模面积就急剧扩大了。湖北京山屈家岭一体化聚落群团核心聚落群所在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面积70万平方米的环壕遗址,内部共有三个聚落(图2,6)¹⁴;湖北天门石家河一体化聚落群团核心聚落群所在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面积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内部至少有4个聚落(图2,2)¹⁵。

第三,由于核心聚落群内有二级核心,即核心聚落与其它普通聚落,所以为了突出各自的地位与等级,又导致内外双城结构城址的出现。其中,内城住的是核心聚落群的核心聚落,外城住的则是核心聚落群的其他成员。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城址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图2,2),其中谭家岭遗址所在就是内城,面积26万平方米;另外,邓家湾、三房湾、蓄树岭三聚落就位于外城中。

距今4.5—4千年,社会矛盾进入不可调和的历史新阶段,并同时崛起了三种新型的超大型聚落组织。其中,以一体化聚落群团为核心的泛亲血缘组织就是聚落集团;不同但又相互邻近的聚落组织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结盟的是早期国家;在不同但又相互邻近的聚落组织之间暴力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关系的就是古国。由于这些聚落组织及其核心的规模都同时升级了,或是一体化的聚落群团。或是一体化的聚落集团,所以就出现了规模面积空前的聚落遗址。其中,浙江余杭瓶窑(又称“良渚”)380万平方米的古城就是一个聚落群团集体驻守的城址(图2,10)¹⁶,陕西神木石峁400万平方米的古城就是二个聚落群团一东一西组成聚落集团驻守的城址(图2,3)¹⁷。

显然,中国史前聚落遗址规模面积的演变历史表明,其一,推动聚落遗址规模面积不断扩大的原动力是文明的起源,是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是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的结果,虽然国家的出现也是这些变化的最终结果之一,但总体上与国家的起源无关,因而无论哪一级规模面积的聚落遗址都不是国家起源的标志;其二,史前任何聚落遗址都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没有一个聚落遗址是地缘化的,也没有一个聚落遗址是地缘化国家的代表;其三,虽然聚落遗址规模面积的演变趋势是不断扩大,但由于时代、分布地域与实力的不同,同样性质的聚落组织之间核心遗址的规模面积也是多样化的不平衡的,因而也不可能确定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或将某一个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就认定是国家出现了的标志。

(二)“特别有内涵”也不是古国诞生的条件和标志

中国的考古早已表明,聚落遗址“特别有内涵”并不是古国诞生的必要条件和标志。

第一,“特别有内涵”遗址诞生的历史原因是先于古国出现的一体化永久性聚落群团的崛起。

聚落遗址“特别”有的“内涵”,实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可移动的公共设施,如城墙、壕沟、祭坛、大型夯土基址、观象台等,另一方面就是可移动的特殊工艺品和其他奢侈品。然而,所有这些在国家出现以前都已经出现了。距今8—5千年期间,由于文明的起源,社会的等级与地位分化,主从关系与核心聚落的出现,导致第一代不可移动的聚落公共设施如壕沟、城墙等就出现了。距今5千年以后,随着一体化永久性聚落群团的崛起,人类社会不仅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代基于实力跨部落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的政治组织,还进一

¹³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第12—21页。

¹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¹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¹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¹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

步推动了聚落遗址不可移动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更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礼制、礼器、贵族和人权神授的观念，从而促使这类组织的核心遗址开始出现了大量可移动手工艺品和奢侈品而进入了“特别有内涵”的历史新阶段。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的城址（图 2，2），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¹⁸就是遗址不可移动公共设施“特别有内涵”的代表；而安徽含山凌家滩则是既有不可移动的大型公共设施又有可移动工艺品与奢侈品的典型代表，其中聚落壕沟与祭坛就是不可移动的公共设施，而 84M4、87M15 则是随葬大量可移动玉器的代表¹⁹。

显然，聚落遗址“特别有内涵”现象早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不是国家起源的条件与结果，更不是国家起源的标志。与此同时，也很难区分哪一级不可移动的遗迹和可移动的遗物就是国家起源的标志。

第二，距今 4.5 千年以后先后崛起了多种新型聚落组织。

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已进入不可调和的新阶段，所以为了应对历史的巨变，社会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大融合趋势，并同时崛起了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三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然而，所有这些新型聚落组织没有一个可以用“内涵”来标注和认定，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衰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

2009—2010 年，考古工作者对塔儿山南、北两麓黄土塬的区域调查²⁰表明，在塔儿山以北涝河以南的尧都区西王村三期文化时期有一个松散型聚落群团（图 3，1）；在 4500 年以后的陶寺文化时期，这个聚落群团自然升级成为了一体化的聚落集团（图 3，2）。然而，面对涝河聚落集团的崛起，只是一个聚落群团（图 3，2）核心的陶寺古城倒下了。“陶寺晚期，城墙被扒毁，中期大墓和中型墓被捣毁，宫殿被破坏，观象台被平毁，灰坑中残杀的人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共存，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色彩。例如宫殿区 I T5026 揭露的陶寺晚期灰坑 HG8 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六层人头骨总计 30 余个，散乱人骨个体 40—50 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有 6 个之多”²¹。

¹⁸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年。

¹⁹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

²⁰ 何弩：《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21 期。

²¹ 何弩：《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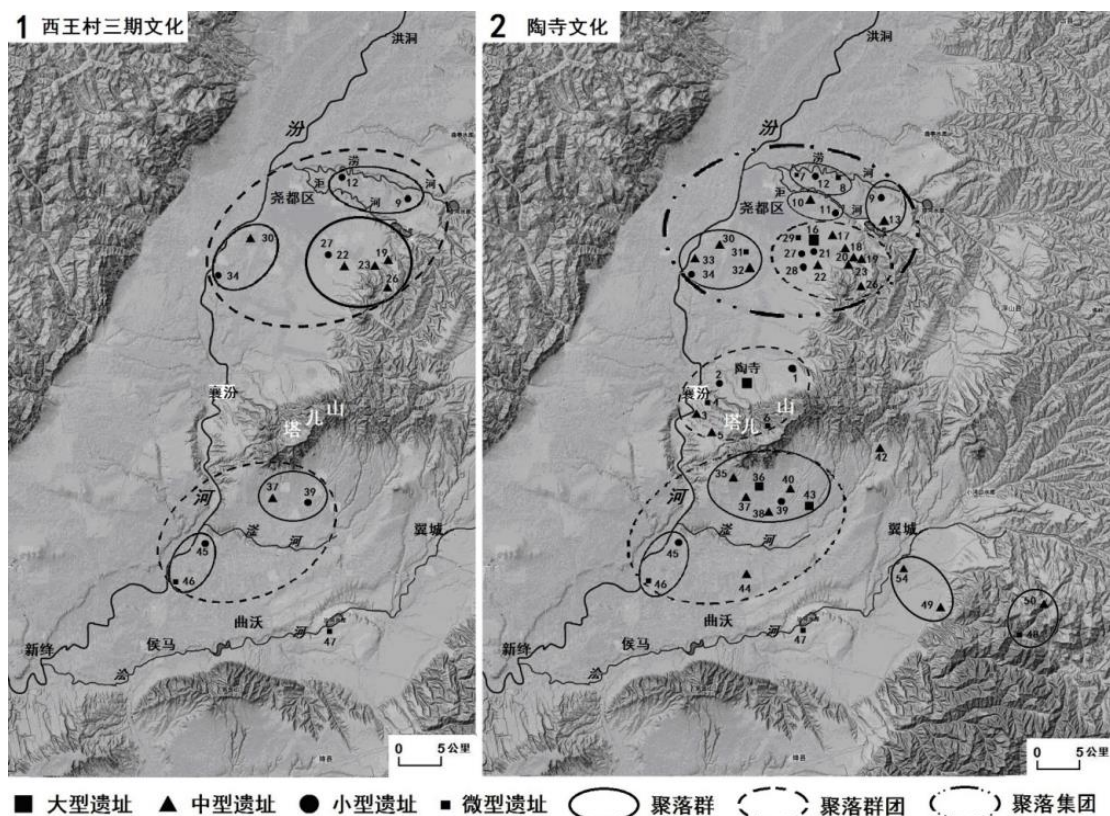


图 3：山西临汾盆地西王村三期与龙山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分布图

（1、2 皆引自何弩《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新进展》；图中实线圈、虚线圈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显然，由于距离陶寺遗址最近，又因为陶寺侵占了原本属汾河集团的领地，还筑城威胁了汾河集团的生存安全；于是，陶寺城址就成了汾河集团血族复仇的对象，也成了汾河古国的统治对象。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汾河集团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个遗址属于“大遗址”，也没有发现一个遗址“特别有内涵”。这说明“大遗址”、“内涵”、实力、古国的关系都是不对称的，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特别有内涵并不是古国诞生的条件和标志；另一方面，根据“大遗址”、“内涵”也根本无法区别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不同的聚落组织，或有关聚落组织的属性；再一方面，各种聚落组织与“大遗址”和“内涵”的关系既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不可能制定一个统一的认识不同聚落组织属性的标准。

（三）公共设施、奢侈品不完全等于实力

文明探源的研究表明，中国考古界的现有研究基本上都将公共设施、奢侈品不加区别一概视为实力的表现，所以一见到“特别有内涵”有实力的“大遗址”就以为是国家。

实际上，大量的公共设施与奢侈品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力，但不完全等于实力。就像现代的一些中东国家，由于石油出口，国家富裕，有关公共设施与高楼大厦林立，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都应有尽有。然而，这些国家却实力相对较弱，无论是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内的硬实力，还是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构成的软实力。与此相反，以色列却是有实力但却不那么外露的国家，谁有威胁就先下手打谁。

史前也一样，千万不能将距今8千年以后出现的壕（濠）沟、城墙，距今5千年以后出现的贵族与奢侈品都当作了实力的最高标志。正如山西襄汾陶寺一样，那里的城址、大墓，以及出土的龙纹陶盘，足以说明其富裕程度超过了同时期的汾河集团；但是，陶寺最后的衰落和家破人亡却表明它的真实实力远不及一点公共设施与富裕迹象都没有的汾河集团。显然，史前实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组织的规模与一体化的程度，因为籍次就可以用暴力征服不同血缘不同地域的其他聚落组织。否则，就不可能降服对手，并建立具有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

的统治关系的古国。

已有的发掘资料表明，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目前所见主要的还只是一些公共设施，如三重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图1）；至于显示贵族“特别有内涵”的奢侈品则一件没有；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发现显示了这处遗址具有征服他人的实力，或被它所征服的对象与聚落遗址。

正因为如此，在没有证据显示并证明它具有非凡实力之前，双槐树遗址又凭什么能够担当“河洛古国”的历史重任呢？

（四）双槐树的真实属性

根据已有的调查资料，巩义双槐树遗址所在只是一个一体化永久性的聚落群团。

由图4（2）可见，该群团至少有10个聚落遗址，3个聚落群。其中，双槐树所在就是核心聚落群所在的遗址。根据遗址平面图（图1）可知，遗址内共有三处墓地，各自不仅独立性明显，而且面积巨大。其中，“墓葬一区”、“墓葬三区”面积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由于史前血缘社会既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也有聚族而葬的传统，所以这些墓区同时同规模的独立存在，很可能就是核心聚落群内不同氏族的墓地。“墓葬三区”，不仅位于遗址中心部位，而且还有重要墓葬，并距离大型建筑基址很近，所以应该就是聚落群内核心聚落与氏族的墓地；而位于中壕与外壕之间的“墓葬一区”、“墓葬二区”则应该是聚落群内其它普通成员和氏族的墓地。

类似双槐树这样的遗址在国内已发现很多，仅湖北距今5000年以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就不少于4例，即荆州阴湘城、京山屈家岭、荆门城河、天门石家河等。发掘还表明，它们与双槐树完全是同一性质的遗址，即聚核心聚落群集体居住的多聚落遗址，但每个遗址具体的居住方式和营建方式又各具特色。

荆州阴湘城就是城内聚落群由二个聚落，一东一西构成的典型（图2，7）²²。

京山屈家岭就是环壕内聚落群由三个聚落构成的典型（图2，6）²³。

荆门城河也是城内的聚落群由三个聚落构成的典型（图2，8）²⁴。城址总面积70万平方米，内有三处高地。其中，核心聚落位于中部高地，周围有内城河（即濠沟）环绕。另外，城内东、北部的岗地则是其它聚落的驻地。经调查，城内每个高岗地都有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堆积，说明城内同时驻有3个聚落。

天门石家河是城内聚落群由四个聚落构成的典型。其中，核心就住在内城里，其他成员就住在外城里（图2，2）²⁵。

显然，上述遗址属性的相似性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其它遗址都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其之所以会出现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遗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成为了河洛古国，而是因为它成为了永久性部落联盟即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与规模虽然都升级了，成为了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但它的实力仍然有限。

一方面，由图4（1）可见，它所处地理位置完全是郑洛之间的丘陵山地，这对于以农业为食物主要来源的人群而言，其经济的自然发展条件肯定不如郑州、洛阳等平原为主的地区。



另一方面，丘陵山地内的遗址数量也明显相对稀少。

再一方面，与同期的洛阳盆地相比，双槐树所在组织都弱势明显。当时，洛阳盆地最大的聚落群团就是 D 群团（图 4，2，D），由 6 个聚落群 20 个聚落构成，总体规模面积 326.9 万平方米，无论个体数量还是总体规模都远远超过双槐树所在聚落群团，整体实力也在双槐树聚落群团之上。

显然，衡量双槐树遗址的实力绝不能因为个别遗址个体面积较大，有三道环壕，就可以称王称霸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全面综合地评价双槐树遗址的性质及其实力。

三

为什么中国考古学及其专家会无根无据地抬出一个“河洛古国”呢？表面上看是一般不同的认识问题，但实际上却深刻地反映了今天学术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严谨求实的学风已经不再，而在多彩考古发现的掩盖下，相关研究日趋虚化、简单化、欧美化。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纯学术的原因主要是缺少血缘社会复原与研究的理念与思想，同时也缺少这方面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为什么要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呢？有二个基本原因。其一，血缘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主要部分。在中国，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是血缘社会。所以，复原并研究血缘社会就是复原并研究人类历史的主要部分。其二，这段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时间非常短暂，虽然有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但识别都非常困难。正因此，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重点，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难点。

自 20 世纪初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历代考古学家们为这段历史的复原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夏墟和殷墟的发掘。但是，新的时代遇到了新的问题，即自苏秉琦先生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以来近 30 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除了浮在表面上大量精彩的考古发现以外，就是毫无遮拦地引进了西方欧美“先进”的“区域聚落形态”等理论与方法。

历史表明，20 世纪西方欧美的考古学经历了二个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前，

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并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就是代表。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学风与学者至今根本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因为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古学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划清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戈登·威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摩尔根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早期的人类社会都是血缘社会，有关社会组织都是血缘组织。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若离开了当时社会原有的组织都不可能真正地复原历史，并揭示历史的特点、演变过程与规律。

与外，已有的事实也证明，毫无遮拦地引进欧美流行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不仅没有解决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还导致了用地缘社会的历史现象来认识和定性血缘社会遗迹遗存的研究简单化倾向。

为什么专家们会将东到西纵贯郑州与洛阳地区近 200 公里，从嵩山北麓到黄河之滨南北向近 40 公里，总面积近 8000 平方公里的范围都划归“河洛古国”管²⁶？为什么将郑州地区的大河村、西山、点军台、汪沟、青台，洛阳地区的土门、苏羊等遗址都视为“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就明显是受欧美“区域聚落形态”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将“大遗址”周边所有比它面积小的遗址都视为它的统治对象，另一方面用面积的大小来定级并确定各遗址之间的从属关系，再一方面就是用地缘社会的理念将一定地区内所有的遗址都按大小分级并视同省、地、市、县一样的组织与政治结构。

显然，正是基于上述国内外史前考古的严重问题，不难发现今天聚焦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学术意义。

第一，有助于端正目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重点。

136 年以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实际就为后人以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为基础，以人为本，复原历史研究历史树立了榜样。今天，在田野发掘资料大量出现的背景下，中国人不仅拥有了在人类学、民族学基础上，而且还拥有了在考古学基础上续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资料和基础。因此，中国考古人不能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方面又沉溺于向西方学习，并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概念去溶蚀和架空血缘社会的真相，而是要继续以人为本将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的历史作为学科的重点。因此，启动和聚焦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将有助于端正学科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第二，有助于解决想走进历史但又苦于无门的思想方法问题。

一般而言，在史前血缘社会，聚落就是聚氏族而居的地点和场所，而聚落群聚形态就是聚落之间以血缘为纽带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组织和遗存形态。

但是，长期以来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和研究却一直是国内外聚落考古的空白，还普遍认为遗址或聚落的分布是无序的一盘散沙，因而就从思想上根本拒绝了血缘社会组织形态的认识与研究。

实际上，早在 1877 年的《古代社会》中，摩尔根就已经发现了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群聚现象，他说：部落内部各氏族“不论怎样扩张他们的共同疆域，其领土总是相互毗邻”；“一个部落一旦分化为几个部落之后，这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相互邻接”，“如几个村落共沿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其居民往往出自同源，而且他们或者处于同一部落政府之下，或者处于同一联盟政府之下”。

显然，史前不仅是血缘社会，而且自有人类以来就属于人类的血缘组织与群体，人类社会所有的存在、发展、变化也都是在相应的组织内部发生的。例如，史前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就没有地缘化的“社会分工”，而只有大型血缘组织内部的“社会分工”。

²⁶ 王丁等：《“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5 月 8 日。

正因此，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血缘社会血缘组织物化形态的认识，有助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产生活实体组织的认识，更为人类走进历史、复原与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平台。

第三，有助于纠正欧美学术界的有关错误思想与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在苏秉琦先生的率领下，考古学中国学派开始崛起。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独创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器物类型学，三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四是文化因素分析法。可是，进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历史新阶段以后，尤其是引进国外的“区域聚落形态”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主要理论方法之后，“中国学派”的旗帜就因为缺少自己独创的理论与方法而黯然失色。

因此，要重振“中国学派”并同步纠正欧美学术界的有关错误思想与认识，惟有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才能担此重任，别无选择！

结束语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要么继续融入以“区域聚落形态”为标志的欧美体系，并用地缘社会学的思想和观念继续浮夸和炫耀史前社会遗迹遗物的历史特点与成就，继续制造更多的“河洛古国”；要么以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为突破口，实事求是地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的血缘社会史。

事实上，基于中国考古的已有发现与资料，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特别困难的研究，关键在于现代考古人的追求与思想意识。

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时代正在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正在呼唤新的理论与方法。

希望考古学能吸取“河洛古国”的教训，也希望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能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应有重视。